

常州词派通论

朱德慈摇著

中华书局

摇摇本书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
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4YJB004)

目 录

前 言	员
第一章 常州词派形成因素	员
第一节 政治气候	员
第二节 经学与诗学	远
第三节 乾嘉词坛	缘
第二章 常州词派的分期与谱系	圆
第一节 发轫期：从张惠言到周济	圆
第二节 拓展期：端木采与“谭、庄”	猿
第三节 光大期：以“四大词人”为中心	猿
第三章 常州词派的批评“家法”	源
第一节 尊体论	源
第二节 托兴寄托论	缘
第三节 正变论	远
第四章 常州词派的创作“家法”	愿
第一节 托咏物以寄怀	愿
第二节 托志艳情 托眷怀身世	怨
第三节 托怀于伤春、悲秋之中	源
第四节 学学问化	源
第五章 常派前期诸子论	苑
第一节 开宗立派 张惠言与张琦	苑
第二节 扩疆拓土 董士锡与周济	愿

第六章摇常派“守成型词人”	吴震
第一节摇许宗衡 :《玉井山馆诗馀》	吴震
第二节摇谭献 :《复堂词》	吴震
第三节摇庄棫 :《中白词》	吴震
第四节摇冯煦 :《蒿庵词》	吴震
第七章摇端木埰词学思想及其词作实践	吴震
第一节摇端木埰词学思想	吴震
第二节摇端木埰词作内容与艺术	吴震
第八章摇“四大词人”的创作道路与共同倾向	吴震
第一节摇“四大词人”归属辨	吴震
第二节摇“四大词人”的创作道路与情感流程	吴震
第三节摇“四大词人”的共同倾向	吴震
第九章摇“四大词人”的艺术风格	吴震
第一节摇半塘词 :英气恢弘摇雄姿坚苍	吴震
第二节摇大鹤词 :淒异劲峭摇声采超卓	吴震
第三节摇彊村词 :和雅浑成摇沉丽俊迈	吴震
第四节摇蕙风词 :侧艳沉痛摇寄情穆境	吴震
主要参考文献	吴震
后摇记	吴震

前摇言

纵观千年词史,自盛唐肇始,至两宋极盛,金元稍歇,朱明不振,及满清则再度复兴。细审之,清词复兴呈马鞍形,历经两个高峰期:一是清初顺、康两朝,一是近代嘉、道以还。

近代词家极盛,“其间特出之英,主坛坫,广声气,宏奖借,妙裁成”,“直欲突过清初,抗衡两宋”^①,“实是词的中兴光大时代”^②。在这个词的光大时代,不特名家辈出,佳作琳琅,而且流派纷呈,各显异彩,其中尤以常州词派人员最众、影响最大、持续最久。唯其如此,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最多。相对于近代词坛的其它派别,如闽词派、楚词派的几乎无人问津而言,现当代学者对常州词派的关注算是够多了。但是,它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许多问题迄今并没有得到圆满解决,有些问题甚至尚未引起学人的重视。大要而言,目前的研究状态是针对其词学理论的较多,针对其创作实践的较少,乃至有人认为常州词派只是一个理论流派而不是创作流派。就常州词派创作研究而言,针对个别词人的较多,进行综合观照的较少,以至于将原属本派作家共同遵循的创作原则都指认为某个词人的个性特色,令普通的读者如堕五里雾中,无从分辨。本稿即力图弥补此两点不足,以研究其创作得失为主,企望在对若干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追寻其整体演变轨迹,把握其整体创作风貌,探究其整体运动规律。然后,返观个体,剔抉出各期代表人物的个性特色,为推动常州词派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做些微薄的贡献。

据林玫仪教授主编的四卷本《词学论著总目(1949—1989)》及笔者对“人大复印资料”所附索引和网上搜索进行的不完全统计,截止到

①蒋兆兰:《词说》,《词话丛编》,页源理缘

②叶恭綽:《全清词钞序》,《全清词钞》,页员

目前,专门或较多涉及对常州派词学理论进行探索的著作主要有《常州派词学研究》(吴宏一著)、《中国词学批评史》(方智范、邓乔彬、高建中等著)、《词论史论稿》(邱世友著)、《中国词学史》(谢桃坊著)、《清代词学》(孙克强著)、《晚清民初词学思想建构》(杨柏岭著)等,较多涉及或专门研究常州派及其作家的著作有《清词史》(严迪昌著)、《清代词学的建构》(张宏生著)、《清词名家论集》(万云骏、叶嘉莹合著)、《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陈子展著)、《中国近代文学史》(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郭延礼著)、《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陈则光著)、《王鹏运及其词》(谭志峰著)、《蒋春霖评传》(黄嫣梨著)等,总体观照常州词派的论文主要有任二北的《常州词派之流变与是非》、龙榆生的《论常州词派》、《清季四大词人》等,计约三十篇;其它研究常州派词人的论文或鉴赏文字一百七十篇左右。

本文的探索就是在上述前贤时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主要采用考论结合的方式,同时兼采符号学、接受美学、解释学、结构主义等方法,对常派进行深入研究,对常派的生成因素、发展历程、阶段特征、各家的词学贡献,特别是对各重要词家的创作成就、个性特色等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细致的辨析。主要发明有:

从政治气候、经学与诗学潮流、词学风会、常州的词学土壤、张惠言的独特经历等不同侧面,全方位揭示常州词派的生成因素。

将常州词派分作发轫、拓展、光大三个发展时期,先后共历五代,从而廓清了常派谱系叙述中的若干误说。

从史程流变的角度,重新梳理常派词学批评的尊体论、比兴寄托论与正变论,并着重追寻这些理论探讨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词创作。

系统总结出常派创作寄托与学问化两大家法的多种操作规则,破除所谓常派词作没有明显特色的陈说。

深入探究张惠言与周济等人的词作内容与艺术,发现众口一辞的所谓常派早期诸家词作“难副其理论”一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偏颇。

揭示常州词派中晚期分别成两大阵营:一个沿着张惠言、周济倡导的比兴寄托方向一直前行,以“托志帷房,眷怀君国”为最高境界,结果导致气度局促,晦涩平钝,此类词人可名之曰“守成型”;一个是在基本遵从比兴寄托的前提下,主动借鉴浙派清空矩范、吴中派的声律学说,取长补短,达到相对圆融的境界,此类词人可名之曰“变革型”。但是,“守成型”词人也并非一概醉心比兴寄托,他们在写景、述行等方面的艺术贡献往往被世人忽略了。

论证庄棫、谭献、冯煦等人的作品中确有“眷怀君国”的成分，只是他们未必全部通过“托志帷房”的方式。

证明兼学白石是常州词派的一个重要表征，常州词派是一个不断汲取、融合其它词派优长的开放性词派。

揭示端木埰在常州词派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突出贡献，深入论证其词学思想在遵从常派重寄托的同时，亦与吴中词派声气相通，要求严格守律，所选《宋词赏心录》正是其折中常、吴二派的标本，在词作实践方面他萦怀国事民瘼，追求清奇俊逸之风。两者均给晚期四大家以启迪。他对王鹏运、况周颐耳提面命，传授心法，影响清季词风尤著。

证明所谓“清季四大词人”仍属常州词派。无论从其理论主张、创作实践方面看，还是从其远祖近宗、取法对象方面看，他们都立足于常州派，所以不必另立“临桂词派”或“彊村词派”。

辨明“四大词人”各自的创作道路与情感流程，揭示“四大词人”之所以并称，乃是因为他们在思想态度、审美选择、遵音守律诸方面存在共性。

辨析“四大词人”各自创作的独特个性：半塘词英气恢弘，坚苍雄姿；大鹤词格调以凄异为主，兼具劲峭与婉丽，具有绘画美和音乐美；彊村词善于缘情设景，变幻时空，哀顽清雄，多臻和雅浑成、沉迈俊丽的境界；蕙风词则以侧艳为一贯基调，晚期以艳笔写沉痛，即性灵，即寄托，高者进入了“穆”境。

揭示朱祖谋、况周颐等人词艺词风的老成期在民国初，他们的遗老心态及其行为有必然的文化因素。

为避免过多重复，凡引用文献的版本情况皆于征引书目中统一注明，当页注释时仅注其所在页码。

第一章摇常州词派形成因素

常州词派是近代词坛势力最大、持续最久、影响最广的一个流派。自其宗主张惠言(字皋文)编刊《词选》以后,“户诵家弦,由常而歙,由江南而北被燕都,更由京朝士大夫之闻风景从,南传岭表,波靡两浙,前后百数十年,海内倚声家,莫不沾溉余馥,以飞扬于当世,其不为常州派所笼罩者盖鲜矣。”^①探讨其形成诸因素是本章的主要任务。

第一节摇政治气候

以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清水教王伦率众揭竿起义为标志,清王朝盛极而衰,开始走向穷途。嘉庆四年(1799)正月,“十全老人”乾隆帝去世。嘉庆帝亲政,迅即捕杀特大贪官和珅,同时采取广开言路,“诏中外陈奏直达朕前”^②等措施,试图肃清吏治,重整朝纲。然而,积重难返,盛世时生成的各种社会弊病到这时日益加剧。乾隆晚期至嘉庆登帝位前后,满清统治最突出问题的至少有如下几方面:

吏治腐败摇表现之一,尸位素餐,因循怠玩。对此,连嘉庆帝也清清楚楚:“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③为宦者则更有生动的记述:“近时有作首县十字令者: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钓中中,七曰梨园弟子殷勤奉,八曰衣服齐整,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十曰座上客常满,樽

①龙榆生:《论常州词派》,原载《同声月刊》第一卷第十号,今据《龙榆生词学论文集》,页 猿苑-猿愿

②《清史稿》卷十六《仁宗纪》,《二十五史》第 猿册,页 怨

③《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一三零“嘉庆九年六月戊辰”,《清实录》第 圆册,页 苑

中酒不空。”^①明哲保身,少理政事已成为官僚们的通病。

表现之二,贪污成风,贿赂公行。贪赃枉法本是封建社会的痼疾,满清中叶则尤甚,因为它的食禄阶层(主要是皇室、旗人、官僚机构、军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庞大。至嘉庆年间,仅就军队而言,八旗兵和绿营兵合计已达一百一十六万人,而当时全国人口总数只有三万万^②。为了要供养这庞大的食禄阶层,清政府不得不听任各级官吏用各种方法向人民巧取豪夺。而官吏们则于强征田赋的同时,外收“火耗”,中饱私囊。当时全国最大的贪官和珅,因善于奉承,得任军机大臣二十四年。史载:“和珅柄政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窃作威福。……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盐政、河工素利藪,以征求无厌,日益敝。”^③除去其平日挥霍外,到后来嘉庆帝查抄时,房屋财产数目依然惊人。据统计,其被抄财产共“有一百零九号,内有八十三号尚未估价。……已估者二十六号,合算共计银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连其两个仆人都有宅子一百八十二间,财产折合白银七百零三点四万两^④。仅就和珅财产之已估价者,已相当于五年多的国库收入。无怪乎民间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然而,嘉庆帝扳倒一个和珅,却无法阻止千百个和珅式的中小贪官前仆后继。恰如薛福成总结的那样:“(和珅)性贪黷无餍,征求财货,皇皇如不及。督抚司道畏其倾陷,不得不攀货权门,结为奥援。高宗英明,执法未尝不严。当时督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蒲龄之伦,赃款累累,屡兴大狱。侵亏公帑,抄没资产,动至数十百万之多,为他代所罕睹。其始未必皆和珅之党,迨罪状败露,和珅不能为力,则亦相率伏法。然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盛。或且惴惴焉,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地。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者也。”^⑤张际亮对此现象有过含泪的控诉:“今之官吏岂惟讳盗而已哉,其贪以朘民之膏脂,酷以干天之愤怒,舞文玩法以欺朝廷之耳目,虽痛哭流涕言之,不能尽其情状。……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刮

①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七《首县》,《笔记小说大观》第 54 册,页 54。

②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绪论》,页 54—55。

③《清史稿》卷三一九《和珅传》,《二十五史》第 54 册,页 545。

④详参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页 24。

⑤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入相奇缘》,页 24。

邑之钱米,易金贿大府,以博其一喜。至于大饥人几相食之后,犹借口征粮,借名采买,驱迫妇女逃窜山谷,数日夜不敢归里门,归而鸡豚牛犬一空矣。归来数日,胥吏又至矣,必罄其家产而后已。……此等凶惨之状,不知天日何在,雷霆何在,鬼神又何在!”^①民间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确系其时贪污成风的精炼概括。

阶级矛盾激化摇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源自三个方面:一是由于人口激增,导致人均耕地面积减少,农民愈益贫困。有位来华访问的英国人这样描述嘉庆朝的人口状况:“在这个国家里,在我们所经过的地方,人口是极为众多,而且到处是那么多,我们走过的乡村前后每一哩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②当时土地与人口平均关系是“百亩之土,可养二三十人”,亦即人均三至五亩方可维持生计。而实际则是这时的人均耕地面积仅有二点五亩,形成了严重的人、地矛盾。“在生活资料来源有限的情况下,人口大幅度增多,必然要造成农民生活的日趋贫困。”^③

二是由于地主豪强加速兼并土地,形成巨大的贫富差异。“在一个农业国度,人口增多,无非是农民阶级的增多和地主阶级的增多。小农增多,则土地分割愈碎,生产和再生产的能力愈弱;地主阶级增多,则兼并之家愈多。”^④如此分化的结果,便是导致了极少数地主占有土地,集聚财富,大量农民无地可种,沦为佃户甚或流民,如同马牛。沦为佃户者,首先受高额地租的剥削,普遍要将收成的一半以上交给地主,其次要为地主无偿服役,“田主之家,婚丧等事,常唤佃民,扛轿役使,平日唤令帮工,几同仆厮。”^⑤沦为流民者,则转徙于密林荒岛、水滨野地,四处乞讨,挣扎在死亡线上。据《清实录》等记载,东南沿海的流民流向台湾,北方的流民流向关外,江浙一带流民聚集区有南田、淮河边,西南流民聚集区则有贵州苗山等。数以万计的流民转徙各地,形成了极不安定的社会因素。而自耕农们则既要明确承担封建国家的大部分赋税,又要承担不法豪强转嫁给他们的赋税,负荷累累,亦苦不堪言。要之,这时的农民“其得以暖不枵寒,丰不啼饥,而可以卒

①张际亮:《答黄树斋(爵滋)鸿胪书》,《张亨甫文集》卷三,页四

②爱尼斯·安德逊:《英使访华录》,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页二

③④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页一

⑤《湖南省例成案》卷五《户律·田宅》,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周人骥文。

岁者，十室中无二三焉。”①

三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激化了官民之间的对立,已如前述。

种种矛盾的交织激化,终于酿成了这样一幅社会图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闾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道路荒而畔岸隳。”②“耕无以为之田,贾无以为之货,居无以为之宅……颠穷之民,父償其子,夫鬻其妻,为臧获奴婢以自存……失业无告,槁项以死,填委于沟洫……饥寒之不忍,起而为窃盗,矫虔无行以入于刑椁枕首死。”③走投无路的百姓们,不得不揭竿而起,以争取一线生机。继王伦起义后,著名的尚有乾隆四十六年苏四十三等领导的西北回族和撒拉族人民起义、乾隆六十年湘黔苗民大起义等。嘉庆元年爆发的白莲教农民大起义,遍及鄂、豫、川、陕、甘,历时达九年之久,更严重地斫伤了清朝统治的元气;嘉庆十八年爆发的华北天理教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甚而至于一度攻入紫禁城。

边患急剧加重摇乾隆末期,欧洲殖民主义国家为了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断地犯我边境。在西部,英国、葡萄牙等殖民者觊觎西藏、新疆,时常帮助当地的民族败类训练军队,或为其提供武器,挑唆他们反叛朝廷,沙俄则直接派兵蚕食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的中国领土。在东南沿海,英国海盗更频繁地进行骚扰,正如曾任驻华公使的美国作家霍尔康所描述的那样:“这些和平商业的开拓者的所作所为,说不上像友好的文明人,而只能说是海盗行径。他们不仅理应为中华帝国所拒绝,而且简直该被中国当局动手消灭掉。这些人不断骚扰中国南海岸,抢劫、破坏城镇,几十、几百地杀死无辜的男女和儿童,然后‘和平地’扬帆而去。或者,他们登上大陆,强迫中国人给他们筑堡垒,以最粗野的兽性掳走妇女,强夺当地人的所有财物,践踏了人道与文明的一切准则。”^④

与武力骚扰或侵犯同步,侵略者们竞相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其中最疯狂的便数英国。英国与中国的贸易从乾隆中叶便大大超越法

①章谦：《备荒通论（上）》，《皇清经世文编》卷三九《户政（十四）·仓储（上）》。

②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一辑，页远。

③张惠言：《茗柯文补编》卷上《吏难一》，《茗柯文编》校点本，页158。

④ 刁 𪔐 𪔑 𪔒 𪔓 𪔔 𪔕 𪔖 𪔗 𪔘 𪔙 𪔚 𪔛 𪔜 𪔝 𪔞 𪔟 𪔠 𪔡 𪔢 𪔣 𪔤 𪔥 𪔦 𪔧 𪔨 𪔩 𪔪 𪔫 𪔬 𪔭 𪔮 𪔯 𪔰 𪔱 𪔲 𪔳 𪔴 𪔵 𪔶 𪔷 𪔸 𪔹 𪔺 𪔻 𪔼 𪔽 𪔾 𪔿 𪕀 𪕁 𪕂 𪕃 𪕄 𪕅 𪕆 𪕇 𪕈 𪕉 𪕊 𪕋 𪕌 𪕍 𪕎 𪕏 𪕐 𪕑 𪕒 𪕓 𪕔 𪕕 𪕖 𪕗 𪕘 𪕙 𪕚 𪕛 𪕜 𪕝 𪕞 𪕟 𪕠 𪕡 𪕢 𪕣 𪕤 𪕥 𪕦 𪕧 𪕨 𪕩 𪕪 𪕫 𪕬 𪕭 𪕮 𪕯 𪕰 𪕱 𪕲 𪕳 𪕴 𪕵 𪕶 𪕷 𪕸 𪕹 𪕺 𪕻 𪕼 𪕽 𪕾 𪕿 𪖀 𪖁 𪖂 𪖃 𪖄 𪖅 𪖆 𪖇 𪖈 𪖉 𪖊 𪖋 𪖌 𪖍 𪖎 𪖏 𪖐 𪖑 𪖒 𪖓 𪖔 𪖕 𪖖 𪖗 𪖘 𪖙 𪖚 𪖛 𪖜 𪖝 𪖞 𪖟 𪖠 𪖡 𪖢 𪖣 𪖤 𪖥 𪖦 𪖧 𪖨 𪖩 𪖪 𪖫 𪖬 𪖭 𪖮 𪖯 𪖰 𪖱 𪖲 𪖳 𪖴 𪖵 𪖶 𪖷 𪖸 𪖹 𪖺 𪖻 𪖼 𪖽 𪖾 𪖿 𪗀 𪗁 𪗂 𪗃 𪗄 𪗅 𪗆 𪗇 𪗈 𪗉 𪗊 𪗋 𪗌 𪗍 𪗎 𪗏 𪗐 𪗑 𪗒 𪗓 𪗔 𪗕 𪗖 𪗗 𪗘 𪗙 𪗚 𪗛 𪗜 𪗝 𪗞 𪗟 𪗠 𪗡 𪗢 𪗣 𪗤 𪗥 𪗦 𪗧 𪗨 𪗩 𪗪 𪗫 𪗬 𪗭 𪗮 𪗯 𪗰 𪗱 𪗲 𪗳 𪗴 𪗵 𪗶 𪗷 𪗸 𪗹 𪗺 𪗻 𪗼 𪗽 𪗾 𪗿 𪘀 𪘁 𪘂 𪘃 𪘄 𪘅 𪘆 𪘇 𪘈 𪘉 𪘊 𪘋 𪘌 𪘍 𪘎 𪘏 𪘐 𪘑 𪘒 𪘓 𪘔 𪘕 𪘖 𪘗 𪘘 𪘙 𪘚 𪘛 𪘜 𪘝 𪘞 𪘟 𪘠 𪘡 𪘢 𪘣 𪘤 𪘥 𪘦 𪘧 𪘨 𪘩 𪘪 𪘫 𪘬 𪘭 𪘮 𪘯 𪘰 𪘱 𪘲 𪘳 𪘴 𪘵 𪘶 𪘷 𪘸 𪘹 𪘺 𪘻 𪘼 𪘽 𪘾 𪘿 𪙀 𪙁 𪙂 𪙃 𪙄 𪙅 𪙆 𪙇 𪙈 𪙉 𪙊 𪙋 𪙌 𪙍 𪙎 𪙏 𪙐 𪙑 𪙒 𪙓 𪙔 𪙕 𪙖 𪙗 𪙘 𪙙 𪙚 𪙛 𪙜 𪙝 𪙞 𪙟 𪙠 𪙡 𪙢 𪙣 𪙤 𪙥 𪙦 𪙧 𪙨 𪙩 𪙪 𪙫 𪙬 𪙭 𪙮 𪙯 𪙰 𪙱 𪙲 𪙳 𪙴 𪙵 𪙶 𪙷 𪙸 𪙹 𪙺 𪙻 𪙼 𪙽 𪙾 𪙿 𪚀 𪚁 𪚂 𪚃 𪚄 𪚅 𪚆 𪚇 𪚈 𪚉 𪚊 𪚋 𪚌 𪚍 𪚎 𪚏 𪚐 𪚑 𪚒 𪚓 𪚔 𪚕 𪚖 𪚗 𪚘 𪚙 𪚚 𪚛 𪚜 𪚝 𪚞 𪚟 𪚠 𪚡 𪚢 𪚣 𪚤 𪚥 𪚦 𪚧 𪚨 𪚩 𪚪 𪚫 𪚬 𪚭 𪚮 𪚯 𪚰 𪚱 𪚲 𪚳 𪚴 𪚵 𪚶 𪚷 𪚸 𪚹 𪚺 𪚻 𪚼 𪚽 𪚾 𪚿 𪛀 𪛁 𪛂 𪛃 𪛄 𪛅 𪛆 𪛇 𪛈 𪛉 𪛊 𪛋 𪛌 𪛍 𪛎 𪛏 𪛐 𪛑 𪛒 𪛓 𪛔 𪛕 𪛖 𪛗 𪛘 𪛙 𪛚 𪛛 𪛜 𪛝 𪛞 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𪜀 𪜁 𪜂 𪜃 𪜄 𪜅 𪜆 𪜇 𪜈 𪜉 𪜊 𪜋 𪜌 𪜍 𪜎 𪜏 𪜐 𪜑 𪜒 𪜓 𪜔 𪜕 𪜖 𪜗 𪜘 𪜙 𪜚 𪜛 𪜜 𪜝 𪜞 𪜟 𪜠 𪜡 𪜢 𪜣 𪜤 𪜥 𪜦 𪜧 𪜨 𪜩 𪜪 𪜫 𪜬 𪜭 𪜮 𪜯 𪜰 𪜱 𪜲 𪜳 𪜴 𪜵 𪜶 𪜷 𪜸 𪜹 𪜺 𪜻 𪜼 𪜽 𪜾 𪜿 𪝀 𪝁 𪝂 𪝃 𪝄 𪝅 𪝆 𪝇 𪝈 𪝉 𪝊 𪝋 𪝌 𪝍 𪝎 𪝏 𪝐 𪝑 𪝒 𪝓 𪝔 𪝕 𪝖 𪝗 𪝘 𪝙 𪝚 𪝛 𪝜 𪝝 𪝞 𪝟 𪝠 𪝡 𪝢 𪝣 𪝤 𪝥 𪝦 𪝧 𪝨 𪝩 𪝪 𪝫 𪝬 𪝭 𪝮 𪝯 𪝰 𪝱 𪝲 𪝳 𪝴 𪝵 𪝶 𪝷 𪝸 𪝹 𪝺 𪝻 𪝼 𪝽 𪝾 𪝿 𪞀 𪞁 𪞂 𪞃 𪞄 𪞅 𪞆 𪞇 𪞈 𪞉 𪞊 𪞋 𪞌 𪞍 𪞎 𪞏 𪞐 𪞑 𪞒 𪞓 𪞔 𪞕 𪞖 𪞗 𪞘 𪞙 𪞚 𪞛 𪞜 𪞝 𪞞 𪞟 𪞠 𪞡 𪞢 𪞣 𪞤 𪞥 𪞦 𪞧 𪞨 𪞩 𪞪 𪞫 𪞬 𪞭 𪞮 𪞯 𪞰 𪞱 𪞲 𪞳 𪞴 𪞵 𪞶 𪞷 𪞸 𪞹 𪞺 𪞻 𪞼 𪞽 𪞾 𪞿 𪟀 𪟁 𪟂 𪟃 𪟄 𪟅 𪟆 𪟇 𪟈 𪟉 𪟊 𪟋 𪟌 𪟍 𪟎 𪟏 𪟐 𪟑 𪟒 𪟓 𪟔 𪟕 𪟖 𪟗 𪟘 𪟙 𪟚 𪟛 𪟜 𪟝 𪟞 𪟟 𪟠 𪟡 𪟢 𪟣 𪟤 𪟥 𪟦 𪟧 𪟨 𪟩 𪟪 𪟫 𪟬 𪟭 𪟮 𪟯 𪟰 𪟱 𪟲 𪟳 𪟴 𪟵 𪟶 𪟷 𪟸 𪟹 𪟺 𪟻 𪟼 𪟽 𪟾 𪟿 𪠀 𪠁 𪠂 𪠃 𪠄 𪠅 𪠆 𪠇 𪠈 𪠉 𪠊 𪠋 𪠌 𪠍 𪠎 𪠏 𪠐 𪠑 𪠒 𪠓 𪠔 𪠕 𪠖 𪠗 𪠘 𪠙 𪠚 𪠛 𪠜 𪠝 𪠞 𪠟 𪠠 𪠡 𪠢 𪠣 𪠤 𪠥 𪠦 𪠧 𪠨 𪠩 𪠪 𪠫 𪠬 𪠭 𪠮 𪠯 𪠰 𪠱 𪠲 𪠳 𪠴 𪠵 𪠶 𪠷 𪠸 𪠹 𪠺 𪠻 𪠼 𪠽 𪠾 𪠿 𪡀 𪡁

国、奥地利、美国等国家,居于首位,而其中绝大部分又由其东印度公司垄断。他们采用各种阴谋手段,破坏中国政府规定的贸易条令,进行不法交易。倾销量最大的便是鸦片。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始,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每年向中国倾销鸦片一千箱。此后逐年增加,至嘉庆初,每年已达四千箱。鸦片的大量涌入,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给中国人民的健康带来了极深的毒害。

面对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不能不深入思考它产生的根源,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以及如何运用适宜的文学载体和手段来反映这一沉重的现实。

张惠言的认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乃因“国家承平百余年,至仁涵育,远出汉唐宋之上,吏民习于宽大,故奸孽萌芽其间。……庸猥之辈,倖致通显,复坏朝廷法度”^①。“至仁涵育”云云虽属门面语,“奸孽萌芽其间”却是实情。如何改变现状,皋文提出“宜大伸罚,以肃内外之政”^②。可是,统治阶级岂肯心甘情愿地拱手献出既得利益?嘉庆帝倒是“大伸罚”了,然而,狂澜既倒,连他也徒唤“朕……虽经再三诰诫,舌敝笔秃,终不足以动诸臣之听”^③。于是,在一部分仗义论谏的梗直之士被陆续打击、挤兑,甚至贬谪、屠戮以后,更多的士人慑于当道淫威,对政局噤若寒蝉,对仕途更加心存畏忌了。反映在文化方面,则是其大多“著书都为稻粱谋”^④,继续着乾隆朝以来的考据学,为之皓首穷经,为之消磨激情。但知识分子的结习使得他们对腐败现实又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因而,他们自然希冀有一种文艺样式既能表达自己的幽微情思,又不致陷入文字狱。此外,其时统治阶级大力推行的八股取士制度抑制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士的发展前途,有的甚至至于连生存权也得不到保障,不得不为衣食而四方奔走,作幕坐馆,“士不遇时”的沉重失望、修齐治平理想的无奈失落成为他们内心共同的情结。对此,他们当然不敢抗议直言,但同样也有着希图表达的愿望。要之,幽怨悲慨成为这个时期士人的普遍心态,他们需要宣泄这种心态的适宜文体。词原本就以深婉为主要特质,具有隐蔽性,有如沈曾植所言:“清宵白月,平旦高楼,古事今情,

①②恽敬:《张皋文墓志铭》,《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554册,页550。

③《清史稿》卷十六《仁宗纪》,《二十五史》第55册,页55。

④龚自珍:《咏史》,《龚自珍全集》第九辑,页5。

国图身遇,茫茫然,惘惘然,瞿瞿盱眙然,若有言,若不敢言。夫其不可正言者,犹将可微言之;不可庄语者,犹将以谲语之;不可以显譬者,犹将隐譬之。微以合,谲以文,隐以辨,莫词若矣。”^①亦如李澄宇所揭示:“文字之狱,诗文易蹈,词则罕焉。诚以词之为物,显者晦之,直者曲之。即有时姓氏事迹刻画靡遗,而阅者熟视无睹。芳草美人,祖《诗》而父《骚》,其效乃竟至此也。此则词所擅长,虽诗称比兴、文号寓言,未可同年而语也。”^②如果于中再强化风骚情致、“比兴寄托”,则正与这一时代大多数士人的心理节律相合拍。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得他们的创作既隐含深厚的历史内容,又呈现出他们独具的文化心态,既表示了对国运民瘼的深切关怀,又包孕着对个人遭际、前途的无限悲慨,既曲曲传达出他们潜存于深层的幽微心声,又不致于在文字表面落下多少招惹灾祸的口实。其实,以词含风骚之旨、比兴寄托为上,早在南宋时就有人提出,明及清前期也不断有人重弹,为什么他们一再推崇词含兴寄,却总也得不到群体回音,而嘉庆初张惠言提出后,很快就得到广大士人的热烈响应?除了前贤仅只是对个人创作的批评,而张惠言则具有理论建构的色彩外,应时运而生,应广大士人的心理需要而生,当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之一。当然,应运而生的不止一个常州张惠言,几乎同时,还有临桂黄苏亦曾较有系统地祭“寄托”以说词,详见其《蓼园词选》。而黄蓼园竟未能开宗立派,又另有原因种种。其中奥秘,张宏生先生已有诠释^③,此不复赘。

第二节 摇经学与诗学

乾、嘉经学与张惠言摇梁启超概述清中叶学风云:“嘉、道以还,积威日弛,人心已渐获解放,而当文恬武嬉之既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源,归咎于学非所用,则最尊严之学阀,自不得不首当其冲。”^④于是,在学术界,中绝已久的以经世济用为指导思想的今文经学乘时而兴,向拘迂繁琐、于世无补的古文经学发动了猛烈的挑战。

①沈曾植:《曼陀罗词自序》,民国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曼陀罗词》卷首。

②李澄宇:《珣庵词序》,民国元年铅印本《珣庵词》卷首。

③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第八章,页四四一—四四九。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页一五五。

常州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发祥地,以庄存与为开山的近代《公羊》学掀起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搏击的狂澜,渐次形成独树一帜的“常州学派”。张惠言恰是这一学派承前启后的中坚。刘师培《近儒学术系统论》述之綦详,曰:

常州之学,复别成宗派。自孙星衍、洪亮吉初喜词华,继辘掇拾校勘之学,其说经笃信汉说,近于惠栋、王鸣盛。洪氏之子怡孙,传其史学。武进张惠言久游徽歙,主金榜家,故兼言礼制,惟说《易》则同惠栋,确信讖纬,兼工文词。庄存与与张同里,喜言《公羊》,侈言微言大义。兄子绶甲传之,复昌言钟鼎古文。绶甲之甥有武进刘逢禄、长洲宋翔凤从惠言游^①,得其文学,而常州学派以成。^②

融于与时俱进的新学风中的张惠言,获益良多。其中至少有两方面面对其创造新词派影响甚巨:一是对“最尊严之学阀”的挑战精神,一是今文学派的治学方法。康、乾时期,适应盛世统治阶级思想要求的浙西词派牢笼词坛,后期虽百弊丛生,如下文引金应珪《词选后序》所论,但其已经固有的地位使得一般人无可奈何,只有得学术新风且能词的张惠言,才敢于率先冲破浙西词派的藩篱。为什么在这股新学术思潮中,不是别人,而偏由张惠言“自是词源疏凿手,横流一别见淄渑”^③?盖其时一般能词者多为浙西词派百年威势所左右,难以跳出圈外,而能够锐感到世势“殆将有变”^④的今文学派经师们又多不预词作,正如梁启超所说:“美文,清儒所最不擅长也。诸经师中,殆无一人能为诗者——集中多皆有诗,然真无足观——其能为词者,仅一张惠言。”^⑤自皋文始,学人之词才继清初之后重又蔚然兴起。

与其他今文学派学者偏重于研治《公羊春秋》稍异,皋文治经以

①案:申叔此述殆误。据龚自珍所撰《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绶甲乃庄存与之孙。存与兄子擅经学者乃庄叔祖。又,宋翔凤乃庄存与之外孙,绶甲之中表兄弟。

②刘师培:《左庵外集》卷九,《刘师培全集》第三册,页 猿猿。

③朱祖谋:《望江南》二十六调之十二,《彊村语业笺注》卷三,页 猿猿。

④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再与杨季子书》。

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页 缘。

《周易》为重点,且专治汉末大师虞翻(字元兴)《易》学,即阮元所谓“求天地阴阳消息于《易》虞氏”^①。其用以突破浙西词派藩篱的正是其治《易》方法,尤其是今文经学派提供给他理论武器:

其一,《易》辞的象意关系理论。《周易·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见意,设卦以见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汉孟喜《周易章句》释之曰:“词者,意内言外也。”许慎《说文解字》袭之。很显然,孟喜书所谓“词”即指《易》系辞之“辞”,亦即《易》之卦辞和爻辞,其所谓“意内言外”即指言之不尽的意已蕴于卦“象”中。皋文治《易》极重“象数”,曾谓:“《易》者,象也。《易》而无象,是失其所以为《易》。”^②又谓:“夫理者无迹,而象者有依。舍象而言理,虽姬、孔靡所据以辩言正辞,而况多歧之说哉?”^③深刻地洞察了《易》之卦象所具有的超越于直言的隐喻象征功能,于是将其与文学创作中的艺术形象沟通,等量齐观,并援之以论赋及词。《词选序》为词正名,论词之本性称:“传曰:‘意内而言外者谓之词。’”即是将词之创作艺术等同于“圣人立象”。他曾对陆继辂说:“许氏云:‘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凡文辞皆然,而词尤有然者。”^④他并非不清楚此曲子词之“词”非彼易辞之“辞”,亦即语词之“词”,他是故意借极受人尊崇的经义来抬升词体的地位,并为自己的词应尚比兴寄托一说寻找强力理论依据。

其二,虞氏《易》学的贯穿比附法。虞氏《易》学的特征之一,就是“依物取类,贯穿比附。始若琐碎,及其沉深解剖,离根散叶,鬯茂条理,遂于大道。后儒罕能通之”^⑤。人们总以为贯穿比附就是凿空乱道,随意附会,张惠言却严肃地指出这恰是鲜为人知的达到“大道”的最佳途径,故他对这一方法备加推崇,不仅以之治《易》,亦援以研词。他认为词之至者皆因“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而其解释的目的就是“义有幽隐,并为指发”(《词选序》)。在《词选》的阐释过程中,

①阮元:《茗柯文编序》,《茗柯文编》,页四四

②张惠言:《丁小正郑氏易注后定序》,《茗柯文编》二编卷上,页一四

③张惠言:《虞氏易事序》,《茗柯文编》二编卷上,页一四

④陆继辂:《治秋馆词序》,《崇百药斋续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 四四四册,页四

⑤张惠言:《周易虞氏易序》,《茗柯文编》,页一四

他的确频繁地如此操作了,如称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是隐寓“哲王又不寤也”、“政令暴急也”^①,称张炎的《谒金门》(晚晴薄)是“不遇可知”^②等。他将某些男女情爱词认作是“感士不遇”(评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忠爱缠绵”(评冯延巳《鹊踏枝》“几日行云何处去”),更是出自虞氏《易》学。其曰:“感莫大于男女。卦言取女,吉,爻则言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也。坎为心,四与初易位,成既济体。两坎五为上之心,三为下之心,二承三上就五,各于其党,则天下和平之义也。三、五皆人之心,圣人之感人心在四,四变则坎心交上下也。”^③此非其男女之情通于圣君之感而何?宋翔凤回忆皋文向其传授说词家法时言:“先生于学,皆有源流,至于填词,自得宗旨。其于古人之词,必缁幽凿险,求义理之所安。”^④结合皋文自述,我们终于明白了其说词的过程——“缁幽凿险”,“离根散叶,鬯茂条理”,“贯穿比附”,其目的是指发幽隐,“求义理之所安”。

其三,庄氏《公羊》学的侈谈微言。庄存与,字方耕,武进人。清代复兴《公羊》学的先驱,主要著作有《春秋正辞》、《春秋要旨》、《春秋举例》。其学术特点是“于六经皆能阐发奥旨,不专事笺注,而独得先圣微言于语言文字之外”^⑤。亦即着意探求《春秋》的微言大义,并总结出一系列《春秋》寄微言于文字之外的体例。刘师培称其“侈言微言大义”,确是一语中的。皋文作为乡后学,又曾与方耕之侄庄叔祖同游京师,商榷经义,与方耕孙绶甲交谊更笃^⑥,故其习稔方耕学术是很自然的。作为庄氏《公羊》学的承传者,皋文不仅将庄氏研究《公羊春秋》的方法应用到自己的《易》学研究中,而且将其悄然移植到词学研究中,侈言词之“兴于微言”,刻意寻绎某首词的政治寄托,一如汉儒解《诗》侈言其政治寓意、庄存与释《春秋》侈言“公羊学说政治性的特点”^⑦。如其称王沂孙《庆清朝·榴花》为“言乱世尚有人才,惜世不用

①张惠言:《词选评语》,《词话丛编》,页 1525。

②张惠言:《张皋文手批 山中白云词》,《词学》第十五辑,页 104。

③张惠言:《虞氏易事》卷二“咸”卦,《皇清经解续编》卷三零六,第二册,页 104。

④宋翔凤:《香草词自序》,见《朴学斋文录》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 1400 册,页 104。

⑤《清儒学案》卷七十三《方耕学案》。

⑥参谢忱《张惠言先生年谱》,《常州工业技术学院学报》1995 年第 1 期。

⑦陈其泰:《清代公羊学》第二章,页 10。

也”、《眉妩·新月》“喜君有恢复之志，而惜无贤臣也”^①等。其再传高弟，亦即刘逢禄门人龚自珍曾于不经意中将张氏以《公羊》学理论治词的秘密曲曲传出^②。仁和谭献记曰：“鲁川廉访官比部时，予入都游从，屡过谈艺。一日酒酣，忽谓予曰：‘子乡先生龚定庵言，词出于《公羊》，此何说也？’予曰：‘龚先生发论，不必由中，好奇而已，第以意内言外之旨亦差可傅会。’鲁翁曰：‘然则近代多艳词，殆出于《谷梁》乎！’盖鲁翁高文绝俗，不屑为倚声故。”^③谭献所记龚自珍言，一向被认为语近诙谐，定位为词坛逸事，或将其作为龚氏自己忧生经世情怀的泄密，很少有人重视其历史价值，盖受谭氏“好奇而已”一语蒙蔽了。殊不知定庵所言，并非无根奇谈，其师之师张惠言说词时所操的正是《公羊》学家庄存与发皇的“侈言微言大义”法。

明乎以上几点，我们再去读张惠言起草的常州词派原初纲领——《词选序》，便会豁然开朗，洞悉其渊源所自了。

当然，皋文援经论词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其一，混淆了文艺创作中的艺术形象与《易》经之象的区别。钱钟书先生指出：“《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也。”^④也就是说，《易》象是抽象符号，与人事活动仅只是异质同构的比附，毫无生命情感可言；艺术形象则是包孕着创作主体情感的具体可感的物象，具有生气活力。混淆了这种区别，“等不离者于不即”，其结果只能是“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丧所怀来，而亦无所得返，以深文周纳为深识底蕴，索隐附会，穿凿罗织。”^⑤皋文说词正是如此。无怪乎王国维申斥曰：“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⑥其二，用“离根散叶”、“贯穿比附”法解剖《易》象，容或可有一得，因为《易》之诸卦内部未必定是严密的系统。而诗词赋等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

①张惠言：《词选评语》，《词话丛编》，页 555。

②刘逢禄嘉庆五年曾在京师“就张惠言问虞氏《易》”，见戴望《谪庵文集》卷一《故礼部仪制同主事刘先生行状》。后来他治《易》即从皋文亦以虞氏《易》为宗，著有《易虞氏变动表》、《卦象阴阳大义》，还曾续补皋文《易言》一书为《虞氏易言补》。

③谭献：《篋中词今集续》卷一，影印本，页 555。

④⑤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周易正义·乾》，页 555。

⑥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王幼安校订本，页 555。